

阿瑟·米勒论剧散文

罗伯特·阿·马丁编

陈瑞兰 杨淮生选译

文化生活译丛

XIII

阿瑟·米勒论剧散文

罗伯特·阿·马丁编

陈瑞兰 杨淮生选译

文化生活译丛

XIII

1134015

阿瑟·米勒论剧散文

ASEMILE LUNJU SANWEN

〔美〕罗伯特·阿·马丁编

陈瑞兰、杨淮生选译

THE THEATER ESSAYS

OF ARTHUR MILLER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A. Martin

Viking Penguin Inc. 1978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29,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02·85

定价 1.45元

文化生活译丛

XIII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印 刷 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阿瑟·米勒

1919年2月

200/11

目 录

原编者的话	1
剧作家序言：清理思序	31
悲剧与普通人	38
悲剧的特性	45
《推销员》的诞生	51
作家多而剧本少	57
到达《萨勒姆的女巫》的旅途	64
论社会剧	70
现代戏剧中的家庭	91
《阿瑟·米勒戏剧集》引言	117
《桥头眺望》(两幕本)引言	204
论赏识	211
戏剧何以不朽?	234
百老汇：从奥尼尔到今天	243
译后记	253

原编者的话

—

1947年1月29日《全是我儿子》^①首次公演，在其后的三十年里，阿瑟·米勒作为一个具有非凡才华及洞察力的作家，其声誉与地位随着他的每一部剧作、著书和电影的出现而与日俱增。人们将他描绘为教育家、具有见地的剧作家或是写作社会剧的戏剧家。他对戏剧的贡献始终如一地是高质量的，尽管在这一时期内，许多评论家显然认为剧院充其量不过是正在消亡的机构，缓缓地让位于商业化的要求、性与虐待狂、电影和电视。但是通过米勒对世界上每个文明国家的戏剧观众及读者所具有的持续吸引力，他的戏剧独树一帜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剧作，与尤金·奥尼尔^②以及田纳西·威廉斯^③的剧作，在很大程度上

-
- ① 阿瑟·米勒的这部成名剧著曾获纽约剧评家奖和唐纳森奖。
——译者注。（以下脚注除标明“原注”者外，均为译者注。）
- ② 以悲剧闻名遐迩的美国戏剧大师（1888—1953）。
- ③ 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1911—1983）。

上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

对于米勒的剧本一向是众说纷纭的。自从《推销员之死》的上演使他蜚声剧坛以来，他很明了自己作为美国活着的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的地位。尽管有些明显的困难，他还是能把他的社会生活及形象与他作为艺术家的生活区别开来。事实上，在活跃地介入当代社会及艺术技巧方面的许多问题与争端时，没有几个作家能象他那样成功地作为一个既是隐秘的又是公开的人物。

在1949年《推销员之死》获得广泛流传而又遭到非议的成功之后，米勒继续从事剧本写作。这些剧本反映了他的信念，即“戏剧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使人类或应当使人类更加富有人性，也就是说，使人类不那么孤独”。他确信戏剧应当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它将严肃的争端公诸于世。他的这种信念一再以各种形式出现于他为自己的剧本所写的引言和其他文章之中。这些引言和文章，在他的剧本背景的烘托之下，阐述了他的信念。我认为，正是通过引言及文章，他最直截了当地说明了他对社会和戏剧抱有的信念，也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剧作家在艺术技巧方面的问题。这些引

言和文章构成了一组美国戏剧及文化史中既出类拔萃又富有意义的评论性著作。从总体上看，米勒的关于戏剧及剧院的散文，可以说是自萧伯纳^①撰写戏剧前言以来出现在英美国家的一个主要剧作家所写的唯一最重要的有关戏剧评论原则的散文了。

正是作为他的信念的产物，目前这本戏剧散文集才被选编出来。在这些重要的文章中，有几篇曾被全文或部分地刊载在研究某一剧本（如：《推销员之死》或《萨勒姆的女巫》^②）或更为广泛地论述剧作家米勒的全面成就的集子里。但是由于这些文章分散地刊登在不同的书籍、报纸及杂志上，除了最执拗的读者，大多数人都感到很困难，无法把它们作为有关他本人的艺术与技巧、理论与实践以及有关他阐述戏剧的重要性的许多见解的一种持续的、综合的评论来看待。现在编入文集的散文文本，除改正印刷错误之外，与首次发表时是一致的。

在对米勒的所有文章进行筛选而着眼于挑出那些足以代表他的跨越三十年以上的戏剧生涯的文章时，我经常为他的广泛兴趣以及他执意把真实与道德

① 世界闻名的英国剧作家（1856—1950），曾写下了许多戏剧前言并成书出版。

② 1953年1月22日首次上演的阿瑟·米勒的名著之一。

作为作品中最优先考虑的孪生观念的强烈程度所打动。在《全是我的儿子》于1947年首次上演时的一次新闻采访中，米勒将他对戏剧的基本理论观点与对戏剧写作的实用手法的看法，作了明确的表达：

在我的所有剧本和书籍中，我都试图从生活中取得舞台背景及戏剧性的局面，它们涉及真实的正确与错误的问题。然后以所能发现的最现实的境地与百折不挠的精神，描绘出道德上进退两难的处境并试图指出一条现实的且又艰难的出路。我看不出如果不以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作为基础，怎能写出象样子的作品来。

虽然这个声明看上去预示了米勒在《推销员之死》、《萨勒姆的女巫》及《桥头眺望》的更加重大的主题思想，但是它实际上把他的过去及未来同时都加以概括了。米勒在1938年毕业于密执安大学和九年之后才上演《全是我的儿子》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作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焦点》1945年）、一本报告文学（《正常局面》1944年）、不胜枚举的广播剧及电影脚本、一出上演了四场便停演的戏剧（《鸿运高照的人》1944年）以及更早一些的十二部左右未经演出的剧本，外加

上作为学生为“霍普伍德写作竞赛”所写的三个剧本——其中的两个获优等奖。十年之后在回顾这一关键时期时，米勒在《阿瑟·米勒戏剧集》^①的“引言”中写道：

那时我三十出头了，写了约有十二部戏剧，其中没有一部是我能真正地认为是完善的作品。我写了许多场景，却不是一部剧本。那时我就认为我只是给一个有机体的剧本形成了某些部分。我决定再写一部，如果它仍然是不可上演的，那么我就另谋职业。

当然，再写的那一部就是《全是我的儿子》。这部剧本的演出，足以使米勒有勇气继续充当一名戏剧家。至少从戏剧的角度来看，《鸿运高照的人》与《全是我的儿子》之间的区别是：在1944年至1946年之间的这一时期，米勒由于前者遭到冷遇而感到失望，从而迫使他重新考虑写作剧本的目的（“我曾设法抓住奇迹，”他说过这话）以及将剧本的客观意义传达给观众的技巧问

^① 阿瑟·米勒在1957年5月23日出版了《阿瑟·米勒戏剧集》（简称《戏剧集》）。

题。如果说《鸿运高照的人》以其“奇迹”出卖了他，那么他的下一部剧本就不得不建立在逻辑的基石之上，以便“使普通人弄懂它”。米勒说过，其结果就是决心放弃创作奇迹的冲动：

但是奇迹出卖了我，而我所有的唯一的另一条路线正是我所采取的——追寻因果、确实的行动、事实、各种关系的来龙去脉并且抑制住任何要表达一个念头本身的倾向，除非它确实是不得不出自一个角色的嘴巴。换句话说，要让奇迹出自事实与心理方面的冲突的逐步而无情的撞击，这时奇迹才象一团薄雾、一股气体、一阵蒸气那样袅袅升起。

当然，这是关于手法而不是关于意义的评论。但是米勒在主题思想方面对“正确与错误的问题”的强调，以及他试图在真实的情况下确定“道德上的进退两难”的处境的做法，都使人想到他在理论上倾向于将客观的与主观的各种力量融合到一起。这种倾向从《全是我的儿子》延伸至《推销员之死》，并且仅以较小的改动继续表现在《萨勒姆的女巫》和《桥头眺望》之中。十二部未完成与未上演的剧本所提供的教训以及《鸿运

高照的人》的失败，毫无疑问，正是《全是我的儿子》首次演出时他所考虑的问题，而且也正是新闻采访时在他一系列的评论的表面之下所考虑的问题。

《全是我的儿子》上演了九个月，从1947年1月29日直到11月8日，共演出328场，一般被认为是米勒的第一部成功之作。虽然评论家们执意要从这个剧本的内容及结构上找出易卜生^①的各种影响，米勒却不断地强调说，易卜生对他来说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与其说对他掌握现实主义的形式方面有影响，倒不如说对他把一个见解变为一种戏剧上的事件的能力以及他使观众倾听他所要说的话的能力这两方面有影响。

作为一个自认是写作社会剧的剧作家，一个将社会剧解释为“完整的人的戏剧”的人，米勒还认为：“社会包含在人之内，而人也包含在社会之内，在你理解其社会关系之前，你根本就谈不上在舞台上创造一个真实地刻画出来的、心理方面的统一体……”在他的更加理论化的文章里，他一再提到社会关系并强调说，戏剧与剧作家，象易卜生首先作出的榜样那样，是社会晴雨

① 挪威戏剧家（1828—1906），其社会剧曾遭到社会上的保守势力的攻击。

表的反映。易卜生、箫伯纳、契诃夫^①、布莱希特^②以及米勒共同持有的哲学思想便是：人类的命运是社会性的；而舞台应当被认为是一种媒介——更重要的是传播见解而不仅仅是提供娱乐，并且应当在打动人的理智方面为严肃的目标服务。

于是，评论界关于易卜生对《全是我的儿子》的影响的争执继续活跃地展开，许许多多评论文章定期地出现在《纽约时报》及各式各样的学术杂志和季刊上，如《现代戏剧》、《教育性戏剧杂志》。反过来说，对米勒—易卜生关系的兴趣似乎比首先引起这场讨论的剧本本身还要来得经久不衰。可以说，米勒的引言和散文不断地响亮地回荡着他认为从事戏剧写作是“一项严肃的事业”的见解，这种见解显然也就是在他的戏剧生涯的早期就愿意提出的形式和手法问题的后果——更不必说他提出的社会问题——而他提出的形式和手法问题直到今天还继续在评论家和学者之中引起生动而理智的争论。

如果《全是我的儿子》暂时让米勒进入美国剧作家的行列，那么他的下一部剧本不仅将他推到这门专业的最前线，而且推进到恐怕在美国戏剧史上再也不会

① 俄国戏剧家、小说家（1860—1904）。

② 德国剧作家、诗人（1898—1956）。

发生的最持久的有关评论方面的争端的中心。《推销员之死》在1949年2月10日公演。一方面《全是我的儿子》在1947年公演是合乎时机的；另一方面《推销员》（《推销员之死》的简称）却敲击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成功与金钱、家园与家庭的关注的那一根没有时间性的神经。所以这部剧本立即受到民众的以及评论界的一致赞扬。尽管对于威利·洛曼作为悲剧英雄的身分持有一些保留意见，但是首次公演达742场，从1949年的2月10日持续到1950年的11月18日。

米勒在他为《戏剧集》所写的“引言”中说过，“《推销员》是一部难以归类、不易把握的剧本，因为其中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进行演讲，以便客观地声明我认为这部剧本所体现的巨大问题。”在本文集编者看来，这是整篇“引言”中最含蓄的句子，因为在这部剧本上演之后的二十八年以来，有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许许多多书籍、论文、前言、随笔、专题论述和专门小组讨论，它们旨在以各种方式来评价、归类、解释、攻击和保卫《推销员之死》的意义和手法。这些讨论象这部剧本一样以生动的方式不断地持续下去。正如米勒所言，这是一部难以归类、不易把握的剧本。

米勒把悲剧性的现象称作“近乎神学方面的虔诚的活动场所”，阐明了他当前的关于悲剧情感的性质、

悲剧所反映的社会以及他在这些年的事业中对于所看到的戏剧发展的估价。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强调本文集所选择的文章从整体上说是他在事业中的不同阶段对这些相同问题的观点的记录，是代表一个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不是斗争，就是解释和澄清他的艺术原则——的文件。当然，没有人会理智地期待一个艺术家在五年之内，更不必说三十年之内，对于自己的作品保持同样的观点。一部为舞台写的剧本是和一篇为读者写的文章有所不同的。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对于米勒尤其适用，因为任何人只要注意这些文章从头到尾都有象一幅挂毯用主要色调编织出来那样的评论性的主线，那么这一点就不言而喻了。通过重复一些关键词语，如良心、信仰、责任心、身分、希望、信念、勇气，他的作品的主题通常就反映在这些文章里——实际上，这些词语也可以用来形容米勒本人，他是一个既公开又隐秘的个人。

但是尽管米勒始终如一地试图将他的基本信念表达清楚，他的许多关于悲剧的理论陈述却对围绕着他的最重要的作品的争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文集中出现的第一篇散文“悲剧与普通人”是1949年2月27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在《推销员之死》首次公演约两周之后。这篇散文主要是针对评论界对这个剧

本最初的反应而写的，它是米勒关于严肃的现代戏剧所具有的悲剧性潜力的第一个重要声明。在四十年代末的背景之下，这篇散文获得了多种多样的好评，并且是他写的所有的理论性文章中引起各种最为极端的反应的一篇。这篇声明间接地回答了那些评论家，如约翰·嘉思纳^①和约瑟夫·伍德·克勒奇^②（亚里斯多德^③的追随者），他们认定悲剧所涉及的人物身分、境界和意识的问题，不言而喻地是超越这个剧本的男主人公威利·洛曼的戏剧性格的。虽然悲剧的问题至少在两千五百年里已被数不清的评论家考虑过了，而且并非由于米勒进入评论界的场地才引起纷争，但是因为他1949年坚持认为过去的定义并不一定都是明确的，所以才引起了纷争。我猜想，引起排山倒海般的批评倾泻到米勒那毫无防范的头脑上的声明在这篇文章的开端就出现了：

我认为普通人与帝王同样适合于作为最高超的悲剧的题材。从表面上看，以现代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衡量，这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现代

① 美国当代著名剧评家、编辑家(1903—1967)。

② 美国当代剧评家。

③ 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公元前384—322)。

精神病学是以古典程式为基础的，例如恋母情结及杀母为父报仇心理，这些都是王族成员的表现，但在类似的感情状况下却适用于任何一个人。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说法肯定要引起学术界和其他各界评论家的愤怒的，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不相信居然会有一部美国戏剧值得讨论。要说不是左道邪说，至少也近似对某些传统的与基本的关于悲剧特性的设想提出了挑战，在较小的程度上就象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十九世纪曾对那相当自满自足的宗教体制的设想提出了挑战那样。与不惹眼地藏藏在文章下部的另一段一起，米勒的关于普通人的声明，明确地向流行的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坚持要求悲剧主人公具有地位或所谓的高贵性格，其实只不过是紧紧握住悲剧的外在形式而已。如果地位或高贵的性格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接下来的就是那些有地位的人的问题才是悲剧的特殊问题。但是可以肯定，一个君主从另一个君主那里夺取领地的权利已不再能够引起我们的激情了，我们对正义的概念也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帝王所想的不同了。